

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

——《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的緣起說明



杜希德先生像

陳 玗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暨歷史研究所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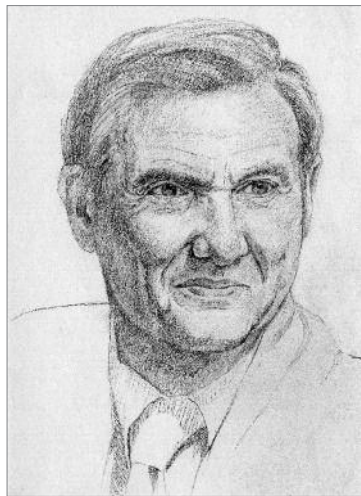
古今論衡 第 20 期 2009.12

「漢學」研究的主流，在二次大戰前後，出現了一場從歐洲為代表的「典範」，到美國為代表的「典範」的大轉移（paradigm shift）。^①

近三十年前，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先生應邀從英國到美國，由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轉任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從學術史的角度看，這在二十世紀歐美漢學波瀾壯闊的「典範大轉移」過程中，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事情。^②

然而，這樣一位宗師級人物的其人其書其貢獻，長久以來，在中文世界裡，卻鮮為人知。這一方面是由於杜公為人十分清高，十分低調，不事張揚。另一方面，也是由於錯綜複雜的西方漢學的學術史，在中文世界中至今仍然是一門十分年輕的學問，剛剛才起步。然無論如何，這都是一件令人十分遺憾的事情。可以毫不誇張這樣說，正像不了解費正清，就無法全面了解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的諸種重要面相一樣，不了解杜公，人們對上述「典範大轉移」的了解，也會打上一個相當大的折扣。

正為如此，我有感而發，在二〇〇六年一月十四日香港《文匯報》副刊上，以〈不該忘卻的杜希德〉為題，寫了一篇如下的短文，對杜公溝通英美學界，在二十世紀後半葉，促成漢學典範轉移的三大里程碑式的「名山」事業，略作簡述：^③



圖一：杜希德先生素描
（史語所翁愈瑁手繪，2007）

① 此處之「典範」（paradigm），原為孔恩（Thomas Kuhn，又譯庫恩）名著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中提出之概念。四十餘年來，此概念深入影響到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成為一個經常在不同場合被化用，並脈絡化（contextualize）的名詞，特此說明。上述孔恩原書有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科學革命的結構》（臺北：遠流出版社，1994），該書為余英時先生作總序的《新橋譯叢》之一種。

② 甚至可以說，杜公當年就與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耶魯大學芮沃壽（Arthur F. Wright, 1913-1976）攜手合作，結為名聞遐邇的跨越大西洋的西人「三劍客」，為完成上述歷史性的「典範大轉移」，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此處所謂之費、芮、杜為「三劍客」，乃取大仲馬《三劍客》小說中「三劍客」並肩作戰，親密無間、形同一體之典，並非謂與費、芮、杜並世的其他漢學家不重要也）。

③ 本文當時以筆名刊出，此處原文照錄，略有刪改，而內容需要補充者，則在本文中以註釋的方式呈現，特此說明。

世紀交接的時候，《華聲報》評出「影響中國 20 世紀的百位外國人」，有外交官、作家、實業家、漢學家和政客等等，很有參考的價值，然而這個名單也有可討論的地方。就美國漢學家而言，已故的哈佛大學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鼻祖費正清（John Fairbank）和耶魯大學研究中古文明的芮沃壽（Arthur Wright）均在其列。如果這兩位夠資格，也許不應該漏掉目前尚健在的杜希德（Denis Twitchett）。

杜希德是二十世紀後半葉西方公認的唐史學界和中國通史學界的領軍人物，一代宗師，其自訂漢名原為杜希德，但因其其在中文世界中（包括港、臺、新、馬），久以崔瑞德名世，他本人亦只好采默認態度。杜氏歷任英國劍橋大學第六任漢學講座教授（首任為英國近代漢學鼻祖、晚清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胡應湘漢學講座教授，除了在國際唐史研究中多劃時代的貢獻外，一生最重要的領導二十世紀後半葉漢學研究學術潮流的成績主要有三個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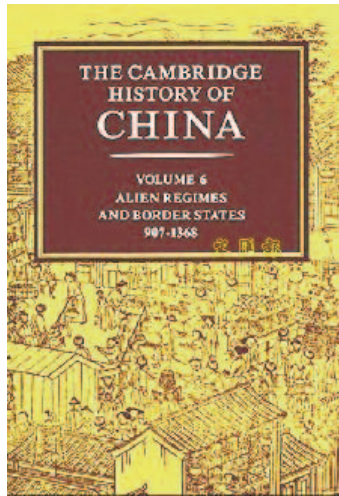
其一，與費正清合作共同主編 15 卷本的《劍橋中國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杜氏負責大部分，為第一總主編，費氏負責小部分，為第二總主編。這套里程碑式的英語學術性中國通史，與其他各種「劍橋史」一樣，其要求十分嚴格，數十年而磨一劍，至今尚在繼續出版中。

其二，在二次大戰後接編「原籍」德國的歐洲漢學名刊《泰東》（*Asia Major*），該刊後又隨杜氏遷往美國普林斯頓，直至九十年代中期杜氏退休為止。*Asia Major* 在二次大戰前與法國的《通報》（*T'oung Pao*）同為歐洲最重要的兩大漢學學報，在杜氏手中變得更加多姿多彩，甚至在其退休後，該刊編輯部轉到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改主編制為編委會制，仍由杜氏任首席編委，現在依然不失為國際漢學界頂尖學報之一。

其三，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為劍橋大學出版社主編 *Cambridge Series in Chinese History, Literature and Institutions* 叢書，其中文直譯雖為《劍橋中國歷史、文學與制度研究》叢書，但杜氏為其確定的叢書漢名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由海外名書法家張充和題寫，冠於每卷的卷首，經過數十年連續推出重要研究成果，在漢學界的影響深遠，已經成為一種經典。不少今天英、美漢學界的重鎮，當年均曾經受杜氏識拔，將其成名專著收入該叢刊首先出版。這些今天的漢學界成名人物包括英國劍橋大學現任漢學講座教授麥大維（David MacMullen）、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Stanley Weinstein、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主任 Robert Hymes、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講座教授 Nicola Di Cosmo、臺

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王汎森（英國皇家學會會士和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已故的華裔美籍學者黃仁宇（黃氏當年以一部《萬曆十五年》贏得國內讀者青睞，從此其書暢銷不已，而在其身後出版的長篇回憶錄《黃河青山》中有對杜氏的知遇之恩的詳細記載）等。他們當年初出茅廬的首部專著，都是通過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而一舉成名。

杜氏現隱居劍橋，不見外客，但繼續在主編《劍橋中國史》，而前來拜訪的門生故舊仍絡繹不絕。



圖二：《劍橋中國史》書影

文章刊出，我當時正遠在紐西蘭任教，當收到樣報，已是次月上旬，即航郵一份到劍橋，沒想到約兩個星期後，忽然傳來杜公二月二十四日因心臟病發、與世長辭的消息。人生之無常，大樹之飄零，令人感慨無已。所幸者，杜公所留下的上述三大里程碑式的貢獻，卻將長久作為歷史的見證，與二十世紀的漢學同在。

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在杜公以上的三大遺產中，除了《劍橋中國史》外，《泰東》學報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兩者，可以說至今仍「養在深閨」，鮮為人識。尤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需要特別提出。該叢刊三十年來，已出版約有五十部之多的專書，在西方名聞遐邇，中文世界中卻極少有人知道它的來龍去脈。⁴十多年前，我在普林斯頓求學期間，曾經向杜公建議，是否應該考慮出版一套中文的精選版？他當時沒有在意。後來在二〇〇五年，再次談起此事時，杜公便命我代他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絡相關事宜。

眾所週知，如今經濟大潮中的學術出版，實屬非易，然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目光遠大，很快就簽訂了合同。於是，由杜公本人任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高克勤兄和我協助任執行主編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工程，就開始啟動。

近日接到出版社電郵，稱《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在二〇一〇年一月開始，就要陸續與讀者見面了，讓我寫一篇緣起說明。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明年二月就已是杜公逝世四週年了，令人感慨無已。

⁴《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一開始由杜公與哈佛大學韓南（Patrick Hanan）先生聯合主編，後由杜公主編。

這篇文章，本來想從當年協助杜公籌備中文版的所見所聞出發，結合我目前正在進行的漢學學術史的研究計畫，比較全面介紹這套叢書在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中的地位與作用，然如此一來，便要寫成數萬言的論文，絕非一篇「緣起說明」的篇幅，所能包括。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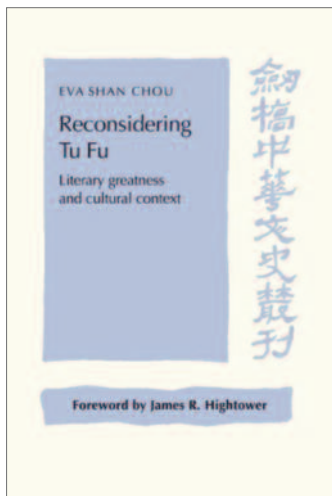
因此，這裡只好先在總體上，對杜公與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的關涉，略作簡述，然後再集中筆墨，就他如何三十年如一日，通過編輯《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為推動上述「典範大轉移」的完成，培養大量傑出學術人才所花費的心力，舉幾個例子。換言之，此處只是以龍麟豹斑，稍窺全貌，與讀者分享。掛一漏萬，在所難免，尚祈諒解。

二

要討論杜公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的關涉，需先對漢學的歷史，作一個簡單的回顧。

「漢學」作為一門學科，始於何時？有「十三世紀」說，有「十六世紀」說，也有「十八世紀」說或「十九世紀」說，聚訟紛紜，莫衷一是。⁶

然而，時至十九世紀末葉，西方諸國始有大學漢學講席之設立，並開始有權威性專業學報之出版，則為不爭之事實。當時正是「殖民時代」的全盛時期，漢學講席與漢學學報，全在歐洲，至於北美與澳洲之後續跟進，則主要是二十世紀的事情了。以大學講席而言，一八一四年法蘭西學院設立漢學講座，一八七五年荷蘭萊頓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一八七五年英國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一八八八年英國劍橋大學設立漢學講座，形成了規模。以學報而言，一八八九九年法國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與荷蘭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 1840-1903）共同創辦的《通報》，出版至今，仍是領域內的權威學報。



圖三：《劍橋中華文史叢刊》書影

- ⁵ 筆者正在準備這樣的長篇論文，其中的部分內容，應邀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以「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轉移——以杜希德為例」為題，發表演講。
- ⁶ 各說之紛紜，此處未能詳，容今後在上述長篇論文中細談。

換言之，通過以上的種種，漢學研究的格局，十九世紀末，已經在歐洲跨國形成。在當時的大學體制中，漢學是「東方學」(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與「古典學」(Classics)等科系為鄰，同屬於「人文學科」(the Humanities)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此出發，到二十世紀初，乃是「漢學」的學門「典範」在歐洲的「形成期」。

這個「形成期」，是通過歐洲內部諸國各自的漢學「小」傳統的典範互相激盪與轉移，經過一個相當時期的「磨合」與「互補」，而逐步完成的。舉例來說，法國有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以中西交通史為中心的考古與語文考據的傳統，德國有福蘭閣(Otto Franke, 1863-1946)的通史傳統，瑞典有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的音韻語言學傳統，荷蘭有施古德(Gustaaf Schlegel, 1804-1884)以秘密會社與娼妓史為對象的社會學傳統、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 1854-1921)以民間宗教習俗為對象的人類學傳統，英國有翟理思(Herbert Giles, 1845-1935)的文學史傳統等等。⁷正是由於這些傑出「小」傳統的細流匯聚而成江海，形成了從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以歐洲為中心的漢學「典範」。

如果用非常粗線條的視野來觀察，這種從十九世紀開始在歐洲型塑完成的學門「典範」，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二次大戰前，仍然是西方漢學的主流與正宗。換言之，雖然從二十世紀初葉開始，美國的漢學研究蓬勃崛起，然而要等二次大戰以後，它才逐步取代歐洲漢學，得到領導世界漢學發展的主流地位。而這一變化的關鍵之一，就是所謂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

二十世紀中葉，從二次大戰的勝利到今天，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的整個知識與學科的結構，也隨之發生了改觀。在此期間，西方的主流大學與研究機構，推動了這一場學科的改觀。在科技理工領域，一系列原來聞所未聞，想都不敢想的新學科，如原子物理、生命科學、電腦工程等應運而生，把世界疆域的邊線，拓展到前所未有的範圍。在人文社會領域，種種新主義與新學派，如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新史學(New History)、符號學(Semiotics)等，如雨後春筍，此伏彼起，打破了原有的學科分界線，以跨領域為時尚，重新進行學門與智識結構的整合，令人眼花撩亂，目不暇接。在這樣總的歷史氛圍中，隨著時間的推移，整體實力而言，美國的高等教育成了西方的典範，而其代表性的大學成了西方的旗艦，與歐洲的主流大學有了新層面的互動交流。

⁷ 本節以上部分同樣內容，我曾在其他論文中強調，參筆者〈高羅佩與「物質文化」——從「新文化史」視野之比較研究〉，《漢學研究》27.3(2009)：321, 335-337。

戰後的美國大學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結構重整過程中，「漢學」搖身一變，從一門主要與「古典學系」等科系為鄰的「冷學問」，銳變為跨學科的「區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中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的「熱學問」，與歷史系、社會學系、政治學系、藝術史系、比較文學系、地理學系、宗教系有複雜交涉，其所跨越的學科，已遠遠超出了「人文學科」(the Humanities)的範圍，而開始進入「社會科學」更開闊的新領地。「中國研究」的對象關懷，也從以前的「古代」為主，漸漸轉到了「古」、「今」並重，甚至「近現代」為主。在這樣的背景中，原來作為「東方學」的分支，而與「古典學」科系為鄰居的「漢學」，為了適應變化中的大學新的智識與學科結構，就不能不經歷一番「典範」的大轉移。

要說到當年發動二十世紀的這場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的大本營，哈佛自當仁不讓，其領軍人物，則無疑是費正清。戰後費氏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到一九九一年去世，四十五年如一日，以哈佛為基地，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中國研究」的傑出人才，引領學界新風潮。

在此種風潮的影響下，美國的東岸與西岸，以及中西部的重要大學中，出現了若干由一流學者領導的「中國研究」的學術中心。例如，芮沃壽在耶魯，狄百瑞(William de Bary, 1919-)在哥倫比亞，牟復禮(Frederic Mote, 1922-2005)在普林斯頓，柳無忌(1907-2002)在印第安那，薛愛華(Edward Schafer, 1913-1991)在柏克萊，劉若愚(1926-1986)在史丹福，都從不同的角度，親身投入這場「典範」大轉移，在各自的領域中，開疆略地，大顯身手，並在他們的學生中培養出許多後來的名教授，繼續拓展與開掘各個相關領域的深度和廣度，型塑「中國研究」的新典範。

「典範」的「轉移」，不等於對舊「典範」簡單的揚棄，而需要推陳出新，實現創造性的轉化。美國費正清等諸公，深明此義，始終不倦，尋求歐洲同行的理解與合作。而在大洋的彼岸，歐洲主流學術機構中的許多漢學名家——如法國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 1894-1979)、荷蘭許理和(Erik Zürcher, 1928-2008)、德國傅海波(Herbert Franke, 1914-)等——也深切感到時代在變化中，美國發動的這場「典範大轉移」是歷史的必然，於是如何與時俱進，互相取長補短，與美國漢學界隔海呼應，共襄盛舉，一起完成這一場歷史性的「典範大轉移」，就成了當年大西洋兩岸同行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歐洲「漢學」界需要美國「中國研究」的新視野，美國「中國研究」界也需要歐洲「漢學」的傳統資源。

在這樣的背景下，杜公當年的渡海赴美，就有一定的存「亡」續「絕」，繼往開來的學術史意義。杜公在渡海赴美之前，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八〇年間，先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OAS)漢學講座教授，後任劍橋大學漢學講座教授，一九六七年獲選

為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執英國漢學研究之牛耳，凡二十年之久。學術界視其為戰後英國漢學界的扛鼎者，與歐洲漢學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乃實至名歸，毋庸置疑。然而，他在轉任普林斯頓之後，將其所攜歐洲漢學的無形資源，連同自己學術生命的全盛期，全部貢獻給了推動歐美「典範大轉移」的功德與事業，卻較少為中文世界所知，這裡便不能不稍費筆墨，略作鉤沉。^③

首先是杜公赴美與普林斯頓漢學的關涉。在中文世界裡，很多人知道普林斯頓是西方的漢學研究重鎮之一，但較少有人注意到普林斯頓的漢學研究的歷史其實相當短，是在二次大戰結束，牟復禮先生到任以後才開始的，更少有人知道普林斯頓的漢學研究之所以能在短短半個世紀的時間裡，取得今天的成績，在一定程度上乃得之於牟公藉當時漢學「典範大轉移」的機緣，筆路藍縷的開創和始終不倦的推動，其中尤重建第一流的圖書館與千方百計禮聘第一流名師。很長時期內，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Gest Oriental Library）的地位，在全美居於同類專業館之第三（哈佛燕京居第一，美國國會居第二）。胡適在戰後，就曾先後擔任館長和名譽館長，直至其去世。



圖四：杜公在普林斯頓

當年東亞系草創之時，牟公有一句目標性的名言：五十年以後，研究中國古代的文史，要到普林斯頓來。在費正清的影響下，哈佛當時在中國近現代史領域，已經在全世界範圍內，穩居領導地位，如日中天。牟公年輕時，也曾受業從遊於哈佛費正清之門，深知此誠不可與之爭鋒。於是乎，牟公在「典範轉移」的大潮中，為普林斯頓設計的藍圖，是以刷新古代文史的研究格局為軸心，貫通歐美、融會中西，努力後來居上，以五十年時間，躍居美國乃至全世界的前列。

一如其所預言，普林斯頓的文史研究果然於上世紀末到達全盛時期，就文學而言，治詩歌與詩學，有高友工先生，治小說與敘事，有浦安迪（Andrew Plaks）先生，在各自相關領域內，與哈佛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和韓南兩先生，同執牛耳十餘年。史學則更盛，余英時先生治漢史、杜希德先生治唐史、劉子健先生治宋

^③ 從此下到本節末，筆者主要採用發表在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香港《大公報》副刊上的〈漢學家牟復禮雜憶〉一文中的文字，而下面第三節的大部分内容與第四節的部分内容，則主要取自於二〇〇六年七月至八月間香港《文匯報》副刊上連載的「劍橋漢學緣」系列文章中的文字。以上種種舊文的合併與改寫，因其均為本人文章，特在此作一次性註明，而在以下隨處納入本文時，免行文繁瑣，一概不另加引號。

史，牟復禮先生治明史，遂使美國研究漢、唐、宋、明史的權威雲集在一個校園裡，真所謂人才一時之選，而令普林斯頓的斷代史研究的大格局，由此奠定，並維持了將近半個世紀。

杜公就是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時空環境中，來到普林斯頓，以其獨有的歐洲漢學背景，與余、劉、牟三位宗匠一起，著手推動中國文史研究的「典範大轉移」，花去了差不多整整十五年的時光。

三

如前所述，杜公在推動二十世紀漢學的「典範大轉移」過程中，有三大里程碑式的貢獻。他與費正清合作主編的十五卷本《劍橋中國史》，作為權威性的「劍橋史」的一種，每一卷每一章約請的撰寫人都是歐美相關領域的頂尖專家，代表了當時大西洋兩岸的中國古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看得出正在潛移默化轉移中的「漢學」與「中國研究」的「典範」天衣無縫的交融。

在同一「典範」的轉移過程中，他從英國帶到美國的《泰東》，其風格內容正好與歐洲的《通報》和北美的《哈佛亞洲學報》相互補充。這份重量級的學報，甚至直到這次「大轉移」早已完成的今天，仍與《通報》和《哈佛亞洲學報》一起，並列為國際間本領域的三大學報之一，⁹只是它的出版地已經轉到了亞洲。這一地點的移位在學術史上的潛在意義，我在本文的第四節中，還要談到。

杜公的以上兩大貢獻與二十世紀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在方方面面的關涉，說來話長，無法詳表。限於篇幅，此處僅聚焦於《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以滴水觀日之法，略窺杜公如何通過這一套世界級學術叢書，為「典範大轉移」的進行與完成，識拔了分佈在歐、美、澳、亞各洲的不止一代的年輕參與者。

據粗略統計，這套《叢刊》三十年來，出版了約五十種專書，其中作者在當時大多數都是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而他們通過自己的專書在《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出版，脫穎而出，後來約有一半都成為出類拔萃、聲名煥赫的頂尖歐美漢學家，除了本文第一節所提到的各位外，容我在這裡再稍舉數例，以見一斑。壯歲曾在《叢刊》

⁹ 在新世紀，由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葉國良主持的〈文學一學門國際暨國內期刊評比之研究〉，以國際專家投票方式，選出三十種「歐美地區」本專業重要期刊，前三名的排名次序分別為：《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通報》（*T'oung Pao*）與《泰東》（*Asia Major*），可見一斑。

中出書，如今已經榮退的大學者，可舉出哥倫比亞大學畢漢思（Hans Bielenstein）、牛津大學杜德橋（Glen Dudbridge）、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侯思孟（Donald Holzman）等等，而其中年紀較輕、現在仍在國際間縱橫馳騁的成名人物——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康達維（David Knechtges）與伊沛霞（Patricia Ebrey）、賓州大學（美國「常春藤八校」之一）林爵（Arthur Waldron）與梅維恒（Victor Mair）、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施吉瑞（Jerry Schmidt）、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艾朗諾（Ronald Egan）、紐約州立大學賈志揚（John Chaffee）等等——則為數更多。此處雖限於篇幅，難以全列，然《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在為「典範大轉移」培養人才方面的貢獻，則可以由此略見。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以上的舉例名單，尚完全沒有包括《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當年推出、如今已成為國際級人物的華人學者。本文限於篇幅，即使只面對這樣一張「不完全」的舉例名單，也完全沒有辦法展開稍微詳細的討論，較為深入揭示《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在「典範大轉移」過程中，在培養西方下一代的大學者方面所作的持續貢獻。正因為如此，筆者在這裡避開上述的那張煊赫的名單，只舉兩個「邊緣」的例子，從側面說明《叢刊》的功能。第一個是澳洲漢學界的費思棻（Stephen Fitzgerald）的例子，討論「海外華人」的研究議題，如何在「典範大轉移」中，從「非主流」變成「主流」。另一個是華人學者黃仁宇的例子，觀察在「典範大轉移」中，華人學者的特殊作用與地位變遷。

二十世紀下半葉，西方的漢學大家中能參與其本國的對華政策之制定，一言九鼎，而有全世界聲譽者，有兩位自訂的漢名都姓「費」的先生，而這兩位「費」公與杜公都結下了不解之緣。第一位自然是美國費正清。第二位就是這位費思棻，此君既是七〇年代初曾任駐北京大使，又曾任澳洲國立大學的遠東歷史系的教授暨系主任。讀者也許不知道，在上世紀的澳洲國立大學中，曾有過兩位享國際聲譽的漢學家。一位是後來回瑞典接任斯德哥爾摩大學漢學系主任的馬悅然（Nils Göran David Malmqvist），後來成為炙手可熱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六〇年代則擔任澳洲國立大學東方語言系主任。另一位就是費氏。這樣一位名副其實的政治與學術的兩棲人物，稱之為南半球的「費正清」，也並不為過。

這位日後在學界和外交界春風得意的費思棻，其年輕時初出茅廬的成名作《中國與海外華人：北京 1949 至 1970 年間之政策變化研究》（*China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a Study of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1949-1970*），就是因杜公賞識，而收入《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出版的。此書研究的是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〇年北京的華僑政策的變遷，涉及各階段華僑政策的變遷和海外華人活動史的方方面面。今天的海外華人的問題研究，不管在歐洲與北美，還是在澳洲和亞洲，都是一門很熱的「顯

學」，但三十年前，在古代中國研究占主導地位的漢學界，則還是「冷門」。同樣，今天的澳洲國立大學，是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現代中國的研究重鎮，當時該校在這個領域裡卻還剛剛起步，費氏和後來曾出任香港大學校長的王賡武先生，就是當年在此筚路藍縷、以啓山林的一代拓荒者。

回首當年，一個澳洲的學者，要在劍橋大學出版社這樣的主流重鎮出版一本寫「海外華人」議題的學術著作，談何容易。相對於《叢刊》的「歷史、文學與制度」三大重點而言，「海外華人」研究，更是一個十分「邊緣」的題目。所幸者，杜公常敢破格，當年「出冷門」，決定把費思棻的這部處女作收入權威性的《叢刊》，推動「海外華人」研究進入主流的視野，而費氏的生涯也隨之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一九七二年，該書出版後，費氏旋於次年出任澳洲駐北京大使。大使卸任後，費氏重返教壇，在澳洲國立大學培養下一代的學人。他當年所主編的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是今天西方的權威刊物 *The China Journal* 的前身，至今仍在南半球影響不小，而費氏《中國與海外華人：北京 1949 至 1970 年間之政策變化研究》一書，對當代的海外華人研究領域開風氣之先的功勞，更不可低估。

除此而外，杜公在上世紀七〇年代初，至少還有一次大手筆的破格。該次破格的對象，事關如今已名滿天下的黃仁宇的處女作《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一書。今天黃仁宇的名字，不僅學術界中人，連一般大學生和歷史愛好者，都耳熟能詳，達到「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的地步。

然而，讀者也許不知道，黃氏當年在漢學界的崛起，有過一番苦苦掙扎的經歷。《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是一本開創性的著作，以明實錄、明人奏疏筆記、明代地方志等史料為基礎，充分吸收了大陸、臺灣以及歐美、日本的研究成果，對十六世紀中國明代的財政與稅收進行了發人未發的系統分析，不僅當時是一個前沿性突破，至今仍有其學術價值。據黃仁宇在身後出版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的回憶，這本當年對他的學術前途有十分重要的關係的專書出版，與費正清和杜希德兩巨頭都有錯綜複雜的關係。

當時黃氏由費正清邀請，在哈佛修改和殺青此書，本來理當由哈佛出版，然而，該書的審稿人卻與黃氏的學術理念不一樣，提出一系列大手術性的修改意見，在某種意義上等於要求重寫。黃氏沒辦法接受，費正清也一籌莫展。爲了打破此僵局，黃氏則將手稿轉寄給劍橋杜公，希望有一線生機。杜公慧眼識英雄，見此書「預」當時「典範大轉移」之「流」，當機立斷，不僅將此書收入《叢刊》出版，還破例親自作序（杜公作序，在《叢刊》近五十種專書中極少見），力挺其人，黃氏如此方一舉成名。

三十多年過去了，如今黃仁宇和他的「大歷史」，在其身後，如日方中，為一般知識界耳熟能詳。然在當時，黃仁宇雖才華橫溢，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還只是個「三等僧眾」。此話一語道破了當年的華人學者中能升到漢學界頂層者的人數比例。其時也，在美國第一流名校的漢學講壇上法相莊嚴，講經說法者，大多數是西人學者。雖然趙元任、楊聯陞、余英時諸先生，已在哈佛、耶魯、普林斯頓聲名遠播，然在整個漢學界，畢竟是少數。回到《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總體而言《叢刊》中華人著者的比例，約只有西人著者的七分之一。

然而，如今回顧發現，在這場世紀「典範大轉移」完成之後，上述七分之一的華人學者中，幾乎無一「漏網」，全部都成為國際間重要的大學者：除黃仁宇外，美國還有普林斯頓大學周質平、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陳啓雲、Tufts 大學陳荔荔（美國國家圖書獎 National Book Award 得主），臺灣則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以下簡稱史語所）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

正如前述，杜公不輕易在《叢刊》出版的書前作序一樣，當年杜公還有另一條「不成文法」，為免近水樓臺先得月之嫌，《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一般不出版普林斯頓的博士的著作。據我所知，杜公從一九八〇年開始在普林斯頓執教近十五年間，只對兩部普林斯頓博士的思想史論文，別有青眼，破例選中出版：一部是華人王汎森的《傅斯年大傳》，另一部是西人葛艾儒（Ira Kasoff）的《張載的思想》。王汎森今天在學術界的成就有目共睹，此處毋需辭費。葛艾儒後來「投筆從戎」，躋身政界，天涯何處無芳草，年前亦已官拜美國商業部助理部長矣。

簡言之，從《劍橋中華文史叢刊》在上述七人「微時」，即大膽攬其入「典範大轉移」之「局」，以及葛艾儒的小小生涯花絮，都足證杜公當年的知人洞見，有運籌帷幄、決勝於數十年之外的長算。

四

以上圍繞《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出版始末，略述杜公為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培養人才的點點滴滴，真所謂「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然而，顧名思義，上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指的是西方人研究中國古典文史的學術「典範」，如何從歐洲作為「東方學」分支的「漢學」，向美國作為「區域研究」一部分的「中國研究」的方向轉移。換言之，歐洲的「漢學」也罷，美國的「區域研究」也罷，研究的對象雖都是中國的學問，所採用的方法與視野，乃至於學術規範和書寫語言，則都是西方的產物。

衆所週知，同樣是研究中國的學問，在東亞還有一種與之相對應的「典範」，即中國本身「國學」的「典範」。然而，很長一個時期以來，漢學界重視的主要是西方的「典範」，所謂的「轉移」，也一切都發生在西方內部，而對以「國學」為主流的東亞「典範」，則相對比較漠視。究其「漠視」的原因，相當複雜，一言難盡，然其中的一點，是西方學界認為：一方面，中文世界對漢學「典範」的奧妙，缺乏徹底的了解。另一方面，這種「典範」的奧妙，有時也很不容易用中文充分表達出來。

於是乎，無論是西人學者，還是華人學者，要在歐美本領域立足，需有相當數量的高品質英文（或其他歐洲文字）專書與論文，其品質的保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發表論文的學報與出版專書的出版社的學術嚴謹度。因此，《通報》、《哈佛亞洲學報》、《泰東》諸大學報，與劍橋、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史丹福等名牌大學出版社，能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成為左右漢學界學術潮流的風標。這也就是為何杜公當年，憑《劍橋中國史》、《泰東》與《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三者，就能在這場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部分原因。

據筆者見聞所及，二次大戰前，在還是歐洲「漢學」典範主導大局的時代，在沒有西文的專書，甚至也沒有完全自己寫的英文論文的情況下，能被西方漢學界無保留接受的華人學者，捨陳寅恪先生，無第二人。這裡的「無保留接受」的「硬」標準，是牛津的教職。陳寅恪在上世紀的前半葉，漫遊柏林大學、慕尼黑大學和哈佛大學等當時西方頂尖研究東方學的學府後，其以隋唐史為中心的學術，融會國學和漢學，已達到國際間最高境界，而牛津大學於一九三九年對其發出的漢學講座教授（與美國大學的教授制不同，英國大學沿講師制，教授則為 chair，亦即講座教授）之聘（陳先生因故未去就職），足以證明，在這所當時所謂「日不落帝國」最高學府的心目中，陳氏是無可置疑的學術權威。

也就是說，這一張不聘西人、卻聘華人的聘書本身，即表明牛津認為，陳氏雖無英文的著作，卻對「漢學」典範的奧妙，完全掌握，並能與其胸中的「國學」典範融鑄為一，乃有西方漢學家所不及的獨到長處。無怪乎杜公上世紀五十年代在劍橋撰寫研究唐代財政史（其中一部分後來經改寫出版，成為西方漢學界該領域的名著之一）的博士論文時，曾遠渡重洋，擬從遊於心目中的大師陳寅恪之門，後因當時的中英關係，無法得到入廣州的簽證，受阻於香港，而失之交臂。不過，無論如何，陳寅恪在當時，只是一個特例中的特例，沒有普遍意義。

世界進入二十一世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全球範圍的廣義「漢學」研究「氣運」，正在以相當快的頻率，不知不覺中由西文世界向中文世界移動。照如此速度，也許只要在本世紀再過短短的十五到二十年，「漢學」研究的重心，就會從歐美

返回到東亞來，出現第三次國際性的「典範大轉移」。以筆者觀察，這場可能出現的再一次「典範大轉移」，將會以「中文」書寫媒介與「西文」書寫媒介並重，為變化的標誌之一，因為語言、思維模式與「典範」三者之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本世紀的今天，如要找一位主要以中文來寫作，並在漢學界乃至西方人文學界具公認宗師地位的華人學者，當然非余英時先生莫屬。這裡的「具公認宗師地位」的「硬」標準，是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獎（Kluge Prize）。

克魯格獎的得主，不僅漢學界只有余先生一人，全世界迄今也只有七人，而其餘六位都是在人文社會學界有劃時代影響的西人。二〇〇六年，余先生獲得此獎時，出版的中文專書超過四十部。評獎委員會在衡量余先生四十年來，主要在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三所頂尖學府度過絢爛的學術生涯的整體成就時，無疑重點在其中文著作的學術價值。這些中文著作，舉例來說，無論是早期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1987），還是近年的《朱熹的歷史世界》（2003），都透露出一種處處入乎歐洲「漢學」與美國「中國研究」的「典範」之內，又隨時超乎其外的嶄新「典範」，也可以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轉化。這種「典範」絕未停留在傳統的「國學」範圍內，卻是一種以中文為書寫媒介而具有國際化視野的新的研究「典範」，很可能成為下一次「漢學」與「國學」交融的典範轉移的主體。

值得注意的是，在費正清、杜希德等領導的二十世紀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的後期，一個有能力貫通中西各種「典範」的新學術群體，已悄然出現。這裡容我舉例子說明。如眾所知，余先生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使受教於他的學生都能在不同的程度上，得到其治學的精神。本文上節尾談到，《劍橋中華文史叢刊》的著者總數中，有七分之六是西人學者，只有七分之一是華人學者。令人詫異的是，經過上世紀「典範大轉移」的洗禮，今天這七分之六的西人學者中的得大名者約占其總數之半，而其中的華人學者，成功率卻近乎是百分之百。

更令人驚奇的是，上節提到的七位華人學者中，竟有四人（黃仁宇、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先後出自余英時先生的門下。除了黃仁宇為余先生早期在密西根大學參與指導過的博士生外，其他三位略可以分別代表余先生四十年來在哈佛、耶魯與普林斯頓三校中指導培養過的弟子群體，如今全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¹⁰而上述四位成名學者，不約而同，一方面能在劍橋這樣的西方一流大學出版社出書，另一方面

¹⁰ 麥田浩（Hoyt C. Tillman）編，《文化與歷史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一書〈前言〉，由田浩、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分別回憶在上述三校中任教時的余英時先生。

他們的大部分重要學術著作卻繼承余英時先生的學風，都是用中文撰寫的。一葉可知秋，以此為例，上面所談到的未來可能發生的第三次「典範大轉移」，為時或已不遠矣。

杜公在晚年，很可能也感到了將來也許會出現的第三次「典範」轉移，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與史語所發生了三次意味十分深長的因緣。杜公一九九六年應邀從劍橋到史語所作「傅斯年講座」，連開三講。這是杜公一生在全世界所做過的許多次原創性演講中的最後一次重要演講，其內容後來彙為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出版，也成為杜公勤奮著述的漫長學術生涯中的最後一本專書。^①

事後，杜公向不少人談起，他這一次南港之遊的收穫與愉快回憶。以史語所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有不少普林斯頓校友，如黃清連、石守謙、朱鴻林、柳立言、林富士、康豹（Paul Katz）、張彬村、王汎森等，個個都是今天學界響噹噹的人物。雖然其中絕大部分人的博士論文並不是由杜公指導，卻大都曾經在求學時代，得到過杜公的關心與指點。這次來訪，不僅使他有賓至如歸之感，而且看到他熟悉的下一代學者如何將漢學與國學的「典範」，努力融會貫通，嘗試作創造性的轉化，感慨萬千。

次年，杜公即決定將他當年從倫敦遷到普林斯頓的《泰東》學報，再度從普林斯頓遷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這是歐美漢學的三大學報之一，有史以來，破天荒第一次遷到亞洲，「永續經營」，使貨真價實的「漢學」的「典範」，與貨真價實的「國學」的「典範」，有機會直接發生「肢體」的「接觸」和「碰撞」。杜公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洲際遷移的決定，除了為他在從普林斯頓榮退之後，編輯方便外，也許還真有「典範」交流的深意在焉。

如果未來漢學「典範」的第三次大轉移，真的是以「中文」書寫媒介與「西文」書寫媒介並重，為變化的標誌之一，那麼《泰東》這樣的專業西文學報，轉到中文世界來「永續經營」，也許就可以視為是一種「春江水暖鴨先知」的信號。從這個層面上說，《泰東》遷到史語所，也許會在將來見到不同尋常的學術史意義。

杜公二〇〇六年與世長辭之後，他生前任教時間最長的劍橋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的圖書館，都想爭取得到他所遺留的藏書捐贈，結果這批約五千五百餘種的珍貴藏書和全部手稿遺墨，卻經過時任所長王汎森的努力，終於捐給了史語所。圖書的捐贈典

① 杜公一生作過許多重要的演講，印製成書者有四種，其中最重要的有兩種：一為杜公出任倫敦大學漢學講座教授時的就職演講，題為 *Land Tenure and Social Order in T'ang and Sung China*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2)，另一即為此處之 *The Historian, His Readers, and the Passage of Time*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97)。

禮，於二〇〇七年九月十一日在南港舉行，諾貝爾獎得主、中央研究院前院長李遠哲到場致詞，十分隆重。典禮後，這些藏書和手稿，在名聞遐邇的傅斯年圖書館中專設一室珍藏，供人研究，紀念杜公對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作出的傑出貢獻，而門口匾上「杜希德文庫」五個大字，正是出於余英時先生的手筆。

不久前，我去看望王汎森。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我要送你一份珍貴的禮物」，說完拿出一個沉沉的大紙袋，裡面是杜公從一九五四年發表第一篇漢學論文開始，所有英文論文的全部原始抽印本，共有好幾十種之多。英文學報的抽印本，都是在論文發表的當時，限量印刷的，幾十年後再要收齊，非常不容易。學長將這套珍貴的抽印本送給我，是囑咐我精選杜公的重要文章，編一部中文版的《杜希德文存》，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可以進一步了解杜公對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所作的貢獻，也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漢學與國學交融的第三次「典範大轉移」，不至於手足無措。目前中文世界的「漢學」學術史研究，還十分年輕，對於剛剛過去的二十世紀歐美漢學「典範大轉移」的複雜過程，了解比較有限，如何通過《杜希德文存》的編選，推動上述「典範大轉移」的研究，面對這一挑戰性的工作，令人深感任重道遠。

值此之際，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開始陸續與讀者見面，就變得非常及時。

鑒往知來，通過這套叢書的中文版，讀者不僅可以了解杜公的其人其書其貢獻；也可以知道圍繞這套叢書，當年的一批年輕學者，是如何通過參與二十世紀的「典範大轉移」，而成長為如今漢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還可以進一步把握未來學術「典範」可能的轉移方向的脈搏。

回想當年，在眾多的中文世界的出版社中，杜公指定我首先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洽談，正是因為他十分看重上海古籍出版社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推出王元化先生主編的《海外漢學叢書》，格調甚高，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海外漢學叢書》之後，仍不斷推出各種新的漢學書系，用力甚勤，就風格嚴謹而言，首屈一指。如今，《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又即將面世，溫故知新，對於學術界研究二十世紀歐美漢學之「典範大轉移」，與準備迎接二十一世紀未來也許會出現的新的「典範大轉移」，都有無量之功德。